

東西洋考

每月統記傳

愛漢者等編 黃時鑑整理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李解民
封面設計：楊華如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愛漢者等編
黃時鑑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1³/₄ 印張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冊 定價：98.00元

ISBN7—101—01582—4/Z·142

前言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出版的價值，讀者自可從我爲本書所寫的導言中得到瞭解。

如果說東西文化的交流正在日益顯示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積極意義，那末本書的出版可能也是這種歷史運動本身的一個片段，儘管它無疑是十分微小的。

然而，即使茲事體小，如果沒有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它也不會獲得成功。在這裏，我首先要特別感謝哈佛大學東亞系的杜維明教授，由於他的薦介，我才與該校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博士取得了聯絡；其次就要十分感謝吳文津館長，承蒙他誠摯地提供該館所藏《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全套縮微膠捲，同時以最優惠的條件慨允影印出版。在整理工作中，我還得到美國國會圖書館、英國圖書館和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的有關人士的幫助，謹在此一併表示謝意。尤其是英國圖書館的勞曼先生，在初次通信聯繫中他即不僅回答了該館的收藏目錄，而且介紹了他在荷蘭的同行吳榮子女士。一九九五年六月，我與勞曼先生有緣在北京舉行的「十八世紀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晤叙，他回國後又向我提供了四幅圖版的複印件。

原來我在哈佛大學讀到此刊時僅擬寫一篇專文，一九九四年返國後正執筆時，適逢中華書局李解民先生來訪，他瞭解情況後建議應整理此刊影印出版。此事先在杭州大學得到沈善洪校長的贊同，接着又在中華書局得到傅璇琮先生的大力支持，後又經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立項資助。故而可說，此影印本得以問世，乃是由于在學術界與出版界存在不少有識之士。我借此機會對他們那種一切以學術爲旨歸的品格表示敬意。

現影印本除了原文，還包括整理者做的總目、導言和索引。總目的編製，以正文標題爲本，稍加劃一，並參照原刊簡目及正文內容，予以補正，用方括號標示。凡圓括號內文字，係編者所加說明。甲午年二月與乙未年正月，原目均列有「地球圖」，但整理者尚未得見，不明原刊是否確實刊印此圖，盼有知之者示教。做索引的工作得到李苦竹女士的幫助，在此謹表謝忱。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全部整理工作，若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匡正。

黃時鑑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導言

黃時鑑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作為中國境內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在中國報刊史、新聞史和出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已為有關學界所公認。^{〔一〕}但是，這個刊物在國內極少收藏，學者們難以窺其原貌。因此，關於這個刊物的論述，在中國報刊史、新聞史和出版史的論著中，往往不大準確，甚至訛說相傳，更談不上對它進行具體的、深入的研究。一九九三年秋，我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的善本室發現該館藏有三十九冊（不計複本），披覽之餘，喜出望外。後經多種途徑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英國圖書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等所藏該刊情況相核對，可認定哈佛—燕京學社之所藏三十九冊當接近于全帙，或竟是全帙。今據此三十九冊原本，並參考其他文獻，對此刊做一述論。

在述論以前，關於此刊的名稱，需要做個說明。《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哪個是對的？實際上，此刊原本的封面和中縫，即是兩出，時而作《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時而「記」字作「紀」。兩者取其一，今可取「記」字，因為：一、此刊創刊號封面作「記」字；二、直接影響此刊創刊的、先于此刊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用「記」字；三、此刊英文稱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但不能如戈公振所說是「原名」，因為此刊原是中文期刊），「統記傳」是 *Magazine*（今通譯作「雜誌」）的對應詞，似「記」比「紀」更善。此外，此刊自己簡稱為《東西洋考》，這可見于它的若干期的中縫，本文以下也採用這個簡稱。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引述此刊時，均稱《每月統紀傳》，可能是為了有別于張燮撰著的《東西洋考》。論者曾說，《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取名大約受到張燮《東西洋考》的影響，但如今簡稱此刊時，讀者可切勿與張著混同。

一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出版概況

關於《東西洋考》的出版情況，說法很多，十分混亂，今試予以澄清。

最早論述《東西洋考》的是戈公振所撰的《中國報學史》，初版于一九二七年。該書第三章敘說：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原名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自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七年）凡四卷。最初發刊于廣州，所載為宗教、政治、科學、商業與雜俎等。後由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主持，遷至新加坡。至道光十七年，又讓與在華傳播實用知識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此報發刊于中國境內，故我國言現代報紙者，或推此為第一種，因前三種皆發刊于南洋也。

戈氏《中國報學史》是此界開山名作，且再三重版，因而戈氏之說，影響深遠。他說「此報發刊于中國境內，故我國言現代報紙者，或推此為第一種」，是為的論，不過，這裏「報紙」這個詞當即今天「報刊」的詞義，就今天的用詞來說，《東西洋考》乃是一種「刊物」，或「雜誌」。當時，英文 *magazine* 一詞，尚未譯作「刊物」或「雜誌」，而是譯作「統記傳」了。在《東西洋考》以前，中文的刊物，「前三種皆發刊于南洋」，那是指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發刊于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發刊于巴達維亞的《特選撮要每月記傳》（*Monthly Magazine*）和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發刊于馬六甲的《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可見開始時候，*magazine* 的中文譯詞難以確定，或作「統記傳」，或作「記傳」；而且，前文已提及，「統記傳」與「統紀傳」這兩個用法還並存于《東西洋考》本身。

可是，戈氏這段文字的其餘部分並不準確，當進行修正和補充。

「自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七年）凡四卷。」這句話涉及起、止、卷等幾個問題。說《東西洋考》「自道光十三年起」，並無不當，但尚未寫明起自何月何日。有的書籍似是據年推月，說它起自

一八三三年一月，這是沒有根據的。《東西洋考》的創刊號是「道光癸巳年六月」，問世地點是廣州。當時也在廣州出版的英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一八三三年八月號上這樣報導：「一種中文月刊——其第一號本月一日在廣州出版。」^(二) 確切地說，陽曆的八月一日，或陰曆的六月十六日，這就是《東西洋考》創刊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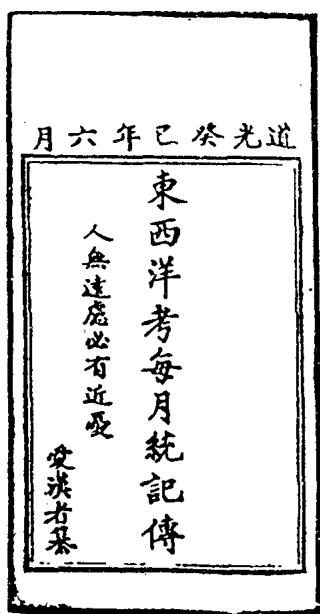
說《東西洋考》止于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這顯然有誤。現在我們已可以見到該刊戊戌正月至九月諸號，道光戊戌是十八年，即一八三八年，此刊物在這一年繼續出版是無可置疑的。但還有一個問題：在一八三八年上，它出版到了哪個月才停刊？現在我們掌握到的刊物本身，最晚的是戊戌九月號，這是不是最後的一期，是不是停刊號？從戊戌九月這一期上，看不到《東西洋考》即將停刊的任何迹象。而且，在《中國叢報》一八三八年十二月號上，關於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被譯稱「在華傳播實用知識會」或「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的報導，有這樣的文字：「中文的統記傳已延續下來，而且除了郭實獵刻印的一八三三年和一八三四年的兩卷，四卷半年合訂本即將完成。」^(三) 這麼看來，《東西洋考》一直出刊到一八三八年年底，似不無可能。但一八三八年陽曆十二月合陰曆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就一八三八年下半年的合訂本而言，是否確實完成了？十月號以及十一月號、十二月號是否確實出版了？似又不能肯定下來。

此外，戈氏總說《東西洋考》「凡四卷」，也有問題。這份「統記傳」，出刊時並不分卷。在它一八三七年遷至新加坡出版後，據中國益智會秘書在同年三月十日所作的報告，「郭實獵先生的中文『統記傳』共十二號的一千份重印本已託付給本會在新加坡的代辦，俾在該地及鄰近地方發行」。^(四) 參照上文，這原先由郭實獵所編的十二號，分訂成了兩卷，除了這兩卷，又有一八三七年、一八三八年的四卷半年合訂本，加起來便是六卷。不管怎樣，「凡四卷」之說是不足為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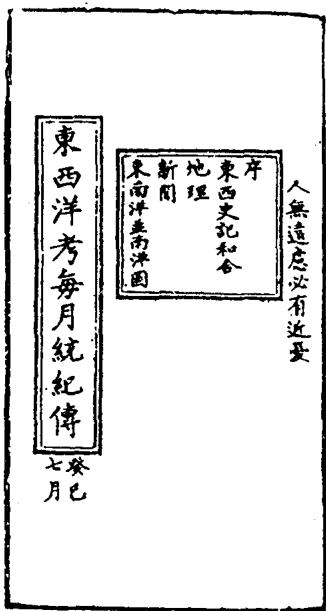
當然，戈氏之說也有來源，其實就是偉烈亞力《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一段相關文字的譯述。^(五) 然而，偉烈亞力的這段文字寫得是頗欠慎重的，他恐怕未見《東西洋考》的原件或所見有限，而且在利用他不難掌握的英文文獻時不夠仔細。

總的說來，《東西洋考》出版的情況，確實是相當複雜的，不僅有它的起、止、卷等問題，而且有它的再版、重出以及中間停刊和復刊等問題。一九六九年蔡武發表《談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一文，^(六) 對這些問題做過考證，提出過若干看法。他主要依據耶魯大學圖書館和康乃爾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東西洋考》，並補以哈佛—燕京學社

圖書館的藏本，認定此刊有橫式版與直式版兩種。橫式版是刊名印在中間，年月印在刊名上方，自右至左橫寫，如圖一所示。直式版是刊名印在左側，年月印在刊名之下，年月分兩行直寫，如圖二所示。道光癸巳年六月的創刊號，是橫式版，「初版六百份問世以後，馬上銷售一空，于是再版又加印了三百份」。(七)這再版的三百份是直式版或直式二版。後來，一八三七年郭實獵將前面所出的十二期重印一千份，分兩卷合訂發行，也是直式版，但癸巳年七月至十二月這六期的頁碼，採用各期連接的序數，且在數字上面加一「上」字，蔡武又稱之為直式三版。于是，蔡武認為：「故前期的《東西洋考》至少發行了三版，其中第一年初版比二版每期早一個月——即初版「道光癸巳年六月」內容同于二版「癸巳七月」，以下類推。」然而，蔡武在細心考察《東西洋考》的版式以後所作的這個論斷卻不能完全成立。



圖一



圖二

據現在可以見到的《東西洋考》以及其他有關文獻，我們只能確定，該刊的創刊號印了三次，而且有三種版式，即橫式版（道光癸巳年六月）、直式二版（癸巳七月）和直式三版（癸巳七月）；但卻不能「類推」癸巳八月至十二月的五期都「至少發行了三版」。實際情況更可能是：在六月創刊號獲得成功後，七月再版並改用了直式版（即直式二版），後來出合訂本時又有了直式三版，而且從八月號開始到十二月號，都採用了直式版，後來與七月號一起出了合訂本。這麼說來，更大的可能是：除了創刊號以外，其他各期也就發行了兩版。而且從目前掌握的原本看，還很難確定該刊各期的初版都是橫式版，再版合訂本都是直式版。以上行文均沿襲了蔡武的版本用詞，現據此刊諸版的實際情況，為了概念的明確與敘述的方便，我們認為可稱創刊號的六月初版為橫式版，其七月再版為直式版，其合

訂本的七月號爲直式再版。

癸巳年以後，甲午、乙未兩年的情況更爲複雜。甲午正月的内容與癸巳十二月相同，但增加了市價篇；而甲午二月至五月各期的内容則全是新的，也都有市價篇。甲午五月以後，未見該年仍有出刊，可能是因爲郭實獵當時忙于他務而無暇顧及編纂了。到了乙未年正月，《東西洋考》復刊；但是乙未年各期最令人迷惑。「道光乙未年正月」是橫式版，但封面語錄同于癸巳十二月與甲午正月，各葉中縫作甲午正月，而其正文内容卻與甲午二月相同，僅少了市價篇。正如蔡武說的那樣，「爲一怪物」。(八)不僅如此，若按照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所藏的乙未年的合訂本，接下去則有「甲午二月」、「甲午三月」、「甲午四月」的橫式版，而其内容則完全與上述「甲午三月」、「甲午四月」、「甲午五月」的直式版相同，亦均無市價篇。再接下去，又有乙未五月和乙未六月的橫式版，内容是全新的，特異的是封面上未登語錄，這在先前未曾有過。從這種混亂反常的情況推想，至少在乙未年正月至四月這幾期出刊時，該刊似無人編纂，不得不以舊刊充數；刻印也不知所措，甚至年代都亂用。這似乎表明，雖然復刊了，但實際上無人主持編纂工作，到了出刊乙未年五月、六月兩期時，才有了新撰的内容。這當然又是郭實獵分身無術的緣故。乙未年即一八三五年，「他受聘爲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之一」，(九)公務十分繁忙。從這年七月起，該刊又不得不停刊一年半，到了丁酉年正月再次復刊，以迄于終。

下面，我們根據迄今收集到的信息，以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所藏版式爲主，附列英國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和康乃爾大學圖書館所藏版式，將《東西洋考》的出版情況列表如下：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出版情況表

年 月	哈佛—燕京所藏版式	他館所藏版式	備 注
癸巳六月	橫式	英國同	
癸巳七月	直式再版	英國、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癸巳八月	直式再版	英國、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癸巳九月	直式再版	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癸巳十月	直式再版	英國、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癸巳十一月	直式再版	英國、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癸巳十二月	直式再版	英國、耶大同，康大藏直式版	一至十葉（內容與癸巳十二月同），附市價篇五葉
甲午正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十一至二十七葉，附市價篇五葉
甲午二月	直式	英國、耶大同	二十八至三十九葉，附市價篇五葉
甲午三月	直式	英國同	四十至五十二葉，附市價篇五葉
甲午四月	直式	英國同	五十三至五十九葉，附市價篇五葉
甲午五月	直式	英國、康大同	各葉葉號下標出「甲午正月」，而內容則與「甲午二月」直式版同，無市價篇
乙未正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各葉葉號下標出「甲午二月」，而內容則與「甲午三月」直式版同，無市價篇
甲午二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各葉葉號下標出「甲午三月」，而內容則與「甲午四月」直式版同，無市價篇
（乙未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各葉葉號下標出「甲午四月」，而內容則與「甲午五月」直式版同，無市價篇
甲午四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封面無語錄
（乙未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封面無語錄
乙未五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以上六期，哈大所藏為一合訂本
乙未六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丁酉正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二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三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四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五月	橫式	英國、康大同	
丁酉六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七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八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九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十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十一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丁酉十二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五
戊戌正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以上六期，哈大所藏爲一合訂本
戊戌二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一至二十
戊戌三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二十一至四十一
戊戌四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四十二至六十二
戊戌五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六十三至八十
戊戌六月	直式	英國、耶大同	葉八十一至九十八
戊戌七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葉九十九至一百十五
戊戌八月	直式	英國、耶大、康大同	哈大複印自耶大藏本
戊戌九月	直式	英國、耶大同	哈大複印自耶大藏本

若據此表，今見《東西洋考》共有三十九期。但其中完全重出的計有六期，故從實際內容而言，共有三十三期。此影印本收入三十九期，包括了重出的六期，是爲了儘量全面地提供該刊的出版情況，以供研究之需。

若據此表，可知《東西洋考》自創刊後，在甲午年（一八三四）和乙未年（一八三五）曾兩度中斷，丙申年（一八三六）全年未出，丁酉年（一八三七）正月復刊後一直維持到戊戌年（一八三八）。但是，終刊在戊戌年的哪個月，尚不能確定。鑒于現存的戊戌年的七、八、九月三號，都是每月單獨編葉，前後葉碼不相聯接，而且該年陽曆的十二月相當于陰曆的十月，已編好四卷之說，至少這第四卷（當是戊戌年七月至十二月號）是難以確定的。究竟此刊迄于何期，目前祇好存疑。或者，在發現九月以後的刊本以前，我們也可以暫時假設這三十九期（或這三十期的內容），就是《東西洋考》的全帙。

二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纂者及其編纂宗旨

關於《東西洋考》的編纂者，可以分兩個時段來說。前一時段是從癸巳年六月創刊到乙未年六月號，在廣州出刊，編纂者是郭實獵。後一時段是從丁酉年正月復刊到戊戌年（現可見至九月號），遷到新加坡出刊，編纂者是中國益智會。

在前一時段，就實際內容而言，郭實獵一共編了十二期，但其中有六期曾經重出，故就出刊的期數而言，共十八期，這在上文中已經述及。這十八期，凡是橫式版，封面上都署名「愛漢者纂」，「愛漢者」就是郭實獵的筆名。(一〇)郭實獵是德國籍傳教士，原名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一八〇三年生，一八五一年卒。他原來屬於尼德蘭傳教會，一八二七年一月初抵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後在廖內群島逗留；(一一)一八二八年到過新加坡和暹羅；一八二九年又到新加坡和馬六甲，在這裏轉而效力倫敦教會；一八三〇年再抵暹羅；一八三一年居于曼谷，從這裏動身去中國。一八三一年、一八三二年、一八三三年，他接連三年對中國沿海各地進行考察，其中在一八三二年是作為英國阿美士德使團的譯員和外科醫生而從事活動的。一八三五年，他被聘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之一；一八四三年八月，他又接替約翰·馬禮遜而成為英國駐香港當局的中文秘書，直至亡卒。

郭實獵作為傳教士，畢生恪盡職守，每到一處都極力傳播福音，後來即使政務繁忙，也不忘教會事務。他從一八三〇年代起又為英國殖民當局服務，也百般效力，搜集情報，出謀劃策，而且在鴉片戰爭期間鼓吹以武力進攻中國，扮演過極不光彩的角色。

同時，郭實獵又是一位學者。他語言能力很強，懂得德文、英文和荷蘭文，來到亞洲後，又學會了中文、馬來文、泰文和日文。他十分勤于著述，共留存各種文字的著作不下八十五種。在全部著作中，中文著作最富，達六十一種。誠然，作為傳教士，他的絕大部分著作屬於宗教範疇，為傳播基督教教義而作。但他編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這個刊物上發表許多中文文章，除了傳教，卻也傳播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宗教、文學、制度、經濟、生物、風俗、科學、技術、新聞和行情等各方面的知識和資料。

到了一八三六年，郭實獵集教務、政務與編務于一身，儘管精力充沛，卻也難以兼顧，他不得不將編纂《東西洋考》的事情停了下來。一八三七年初，《東西洋考》轉由中國益智會主辦。此後的編纂者，各種論著中說法不一。一說「仍由郭氏主編，另有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佐之」。(一二)又一說「中文秘書郭士立、英文秘書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同任該刊編輯，新加坡的麥都思也任編輯」。(一三)但是，這兩種說法都有可議之

處。

中國益智會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於廣州，是由一些廣州外僑組成，郭實獵本人是該會的積極成員。該會成立時，他和裨治文（一八〇一—一八六一，美部會傳教士）被選為中文秘書，馬儒翰（一八一四—一八四三，馬禮遜次子）為英文秘書。一八三七年三月十日該會在廣州美國商行舉行會議，這三位秘書被選連任。這次會議決定由該會代辦在新加坡再版原由郭實獵編纂的十二期《東西洋考》；同時決定：「而後，此中文統記傳的出版由本會主辦。其中文與英文秘書，並望其若干相當的成員，提供篇章。現行價格將予確定。此刊與本會所有其他著作均在新加坡出版。宜當在該地找到一位編者。同時，郭實獵先生與英文秘書將參與編務。本會主辦出版的第一號可能已出刊，以前是為通常中國紀年的正月號。……」（二四）現在尚不清楚，在新加坡是否確實找到了一位編者，如果找到了，他是何人？但是，郭實獵繼續參與編務，是明確的；英文秘書是馬儒翰，他也參加編務，也是明確的。此外，另一位中文秘書是裨治文，他有義務提供文章；還可能有其他成員獻出了筆墨。

這樣看來，《東西洋考》從一八三七年正月號起的主辦者是中國益智會，而它的編纂者，就目前已知情況而言，則確知的是郭實獵和馬儒翰，可能在新加坡還有一位，今尚不知其名。蔡武之說，不提馬儒翰，反稱「裨治文佐之」，恐怕是對《中國叢報》上的英文原文未加細讀的緣故。不過，裨治文是中文秘書之一，他又與郭實獵、馬儒翰交往密切，實際上對編纂工作有所協助，還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新加坡的麥都思也任編輯」之說，今實難以認定。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一七九六—一八五六）是倫敦傳道會牧師，一八一六年抵印度馬德拉斯（Madras），一八一七年抵馬六甲，協助米憐（William Milne，一七八五—一八二二）的出版工作，從一八一九年起輾轉游歷南洋各地，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間在巴達維亞出版《特選撮要每月記傳》，從一八三五年起始訪問廣州，並到中國沿海一些地方游歷傳教。一八三六年四月六日回到巴達維亞，隨即經鹿特丹（Rotterdam）返英，于八月五日抵達倫敦。他在倫敦聞知留在巴達維亞的長女去世，遂于一八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乘船離開英格蘭，並在這年十一月五日到達巴達維亞。（二五）按照這份詳細的日程表，可以判斷，在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三八年，麥都思是不可能在新加坡擔任《東西洋考》的編輯的。我們認為，「新加坡的麥都思也任編輯」之類說法的作者，大約誤讀了白瑞華著《中國報紙》一書上的文字。這段文字譯成中文當是：「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此統記傳再次在新加坡刊印。郭實獵與馬儒翰從廣州參與編務，直到第一次英中戰爭前夕該

統記傳（與該會其他事業一起）結束前不久由麥都思負責照管。」（二六）所以，《東西洋考》是在麥都思的照管下終結的，但他那時已無暇無力去編輯它。

關於《東西洋考》的編纂宗旨，不乏論者。我們現在從基本的原始資料出發，做一些具體的論述。
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郭實獵起草過一份出版此刊的緣起，今全文譯出如下：（二七）

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並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已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獨中國人卻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仍自稱為天下諸民族之首尊，並視所有其他民族為「蠻夷」。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

本月刊現由廣州與澳門的外國社會提供贊助，其出版是為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學與準則。它將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蠻夷」；編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又，悉知外國人與地方當局關係的意義，編纂者已致力于贏得他們的友誼，並且希望最終取得成功。

由于此間外國社會的全體成員在此一工作順利進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編纂者希望在他们中間發現足夠訂購數以支付費用；再說，至少在數月之內，中國人本身必不能重視一種如此性質的出版物，因而可立即期待于他們的祇是少量的支持。

訂閱將限于六個月，每月至少一期，總共投送七期。各期將發行有則：每期將包括二十葉以上，並附有地圖、插圖、地理學與天文學主題的說明，等等。倘若這事得到社會的支持與贊助，它將相當地擴增一些補充資料。

簡而言之，這份緣起所表達的辦刊宗旨是：鑒于中國人仍然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視異族為「蠻夷」，需要謹慎巧妙地展示西方的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洋人不是「蠻夷」，並且知有不足，願向西方學習，俾以維護在華洋人的利益，發展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當然，其目的是在維護洋人的利益，而且實際上是為英國商業資本打開中國門戶而服務的。但同時，它所揭示的當時「中國人」的自我封閉、昧于世情的落後意識，也是客觀存在的，它阻礙中國的進步，確實需要傳入一些異質的外來文化來搖撼與激蕩。

郭實獵這時對中國與中國人已經知之較深，他知道辦這麼一個刊物來傳播西方文化，不能操之過急，必須做到「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相反，必須與廣州地方當局處好關係，「贏得他們的友誼」。而就刊物本身而言，他更是極其慎重地來貫徹自己的宗旨。《東西洋考》癸巳六月創刊號上有一篇《序》，由此可見郭實獵是如何在中國讀者面前宣佈其宗旨的。

此《序》全文，可見于本書，故不贅引。此文以大量中國典籍的文字，特別是孔子的語錄，來說明「多聞」的重要性，「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因而「鼎興正道，黜斥異端，闡發藝文，是君子之專務矣」。進而言之，「蓋學問渺茫，普天下以各樣百藝文滿，雖話殊異其體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國之知分別，合諸人之知識，致知在格物，此之謂也」。爲了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化，仍要引用中國經典尋到根據，而且聲明西方文化也祇是有別于中國文化的殊異的一枝。再說，「夫誠恐因遠人以漢話闡發文藝，人多懷疑以爲奇巧」，所以強調「國民之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疏密異形，要其水源則一」。「倘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也，請善讀者仰體焉，不輕忽遠人之文矣。」最後，作者揭示的口號是：「合四海爲一家，聯萬姓爲一體，中外無異視。」（二八）

關於這篇序文，蔡武認爲：「可謂十足的八股，對於想要傳西學入中國，和中國人較量上下的動機卻隻字不提，由此亦可見郭氏的爲人如何謹慎。」（二九）其實，「傳西學入中國」等動機不是「隻字不提」，而是謙恭又巧妙地掩蓋在當時中國讀者可以接受的言詞之下了。郭實獵似乎理解了「循循善誘」的意思，而且竭力貫徹，也可謂用心良苦了。

但是，郭實獵畢竟是一位牧師，傳教是他畢生的主要事業。因此，他編纂《東西洋考》，儘管展示西方文明包括了各方面的內容，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行文之間，往往極力加入天主教的觀念。大至宇宙，小至跳虱，在郭實獵等人筆下，上帝是無所不在的。當然，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它的核心就是基督教。對於一個傳教士來說，口不離上帝也是性情之中的，理所當然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與米憐主編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相比，宗教已經不是《東西洋考》的基本內容。有如方漢奇指出的：「宗教仍然是《東西洋考》的必備的內容，上帝在這裏仍有無上權威；但是，宗教內容已退居次位，解釋教義的專文沒有了，闡發基督教義已不是刊物的基本要務。」（三〇）如果說《察世俗》是一種宗教刊物，那末《東西洋考》就是一種由牧師編纂的世俗刊物。

說到上帝，《東西洋考》的相關用詞值得一提。我們知道，在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入華傳播天主教以後，天主教信奉的神，拉丁文中的 *Deus* 一詞，在中文當如何表達，是一個長久爭議的複雜問題。最初，傳教士將 *Deus* 音譯爲

「陡斯」。後來，羅明堅意譯為「天主」，即天地的主宰，利瑪竇又借用儒家的用語，譯為「天」和「上帝」。十七、十八世紀天主教內部的中國禮儀之爭，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 Deus 的中文譯詞問題。到了郭實獵編纂《東西洋考》的時候，郭實獵等新教傳教士似乎還沒有選定對譯 Deus/God 的統一的中文用詞。在《東西洋考》出現過「神天皇上帝」、「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等詞，而且有時候它們是並用的。但似有一個趨勢，越到後來就越常用「上帝」或「神天」這兩個詞，而「神天上帝」這個詞則慢慢消失了。就迄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新教傳教士的中文著作目錄看，馬禮遜均用「神天」一詞，米憐兼用「神天」與「上帝」兩詞；而郭實獵則用「上帝」一詞，麥都思在一八二六年出版《神天十條聖誠注釋》，在一八四〇年出版《上帝生日之論》。或許郭實獵在強化「上帝」這個用詞時起過比較大的作用。當然，在此以後，仍尚用「神」、「真神」和「主神」等詞。此外，順便說一句，在《東西洋考》中，Bible 一詞中文譯作「聖書」，或簡稱為「書」。「聖書」正是馬禮遜與米憐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首次出版中文全譯本 Bible 的用詞，全稱《神天聖書》。一八三九年，郭實獵還在新加坡出版過《聖書注疏》。

現在繼續論述《東西洋考》的編纂宗旨。如果它在癸巳六月創刊號上要憑借孔子的語錄來比較隱晦地宣告自己的宗旨，那末它在丁酉正月復刊時就直截了當地以上帝的名義來闡明本刊的旨趣和內容了。「切祈上帝俯會，垂顧中國，賜漢人近祉亨嘉。」甚至明說，「述史之時，表著上帝之福善禍淫，即是天網之道也」。至於對各項內容的解說，也就簡要地展示了刊物所要傳播的西方文明的門類。最後論及「學問」與「文藝」，又以上帝為發端，同時也引述孔子，使中國讀者感到所論之真切。與創刊號的《序》相比較，這篇復刊號《序》文在貫徹「緣起」的宗旨方面是一以貫之的，但在表現的方式上卻已有很大變化，祇是上述「緣起」中一些不便于用中文明說的話，同樣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

新《序》在表現方式上的變化，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東西洋考》已經出版十二期（包括重出，有十八期），其實際面貌已為讀者所知，如今復刊，有些言詞，特別是上帝的說教，似已不再需要遮掩。二是，刊物出版的地點已從廣州遷到新加坡，在這個不屬清朝政府管轄的地方，西方傳教士可以減少許多顧忌，行文時只需主要考慮讀者的文化心理狀態就無傷大雅。在一種主體文化的邊緣，異質的文化有時更容易移植生根，然後向此一文化的本土逐漸擴散和滲透。

無論從編纂者的宗旨本意而言，還是從現在還能讀到的各期刊物本身而言，《東西洋考》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的